

·学校体育·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 制度困境及实现策略

王先茂^{1,2}, 高红云³, 邓伟², 杨影⁴, 郭冬冬⁵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湖北 武汉 430079; 2.湖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3.湖北民族大学 教学质量评价中心, 湖北 恩施 445000; 4.武昌理工学院 体育课部, 湖北 武汉 430223;
5.武汉体育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文化课教师是发展青少年体育的责任主体之一, 其赋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天然使命和资源禀赋。研究认为, 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政策法规的整体推动、整体健康观念引领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借鉴国外有益实践的积极行动, 这些都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体育发展对文化课教师的强烈需求。然而, 正式制度建设与更新滞后, 难以保障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切实权益; 非正式制度建设效力低微, 不足以催发文化课教师的内在动力。据此, 研究提出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 推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 以学科文化涵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共育校园体育文化, 形成非正式学习空间内师生共在的课外体育制度; 优化学校教育 with 学校体育政策法规, 建立多元主体共同育人长效机制; 祛除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及行为, 躬行体育化、生活化的教书育人实践。

关键词: 青少年体育; 文化课教师; 学校体育制度; 跨学科教学; 健康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G80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1-0094-09

Fundamental logic, systema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strategy of culture teacher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WANG Xianmao^{1,2}, GAO Hongyun³, DENG Wei², YANG Ying⁴, GUO Dongdong⁵

(1.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China;
3.Center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445000, China;
4.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ch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23, China;
5.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responsible subjects, culture teachers are endowed with the natural mission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overall promo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youth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nd people's ardent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under the concept of overall health, and the positive action that to learn the foreign beneficial practice for building up China into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are the demand mechanisms of culture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However, culture teachers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face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lagging form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ailure of informal system construction. Given that,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carrying out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cultivating the

收稿日期: 2023-08-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XTY002); 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3258);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22GA050)。

作者简介: 王先茂(1988-), 男, 在站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学校体育。E-mail: wxm_0214@163.com

students' core physical education quality with the subject culture; cultivating the campus sports culture, and forming the extracurricular sports system wher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 the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optimiz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joint education mechanism by multiple subjects; eliminating the utilitarian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nd actualizing sports-oriented and life-oriented educat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e teache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ystem;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healthy lifestyle

发展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据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87.9%的人口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小学及以上的学校教育。因此,必须明确学校是落实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关键场域。文化课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是主导实施“教育活动中的体育”^[1]的主要责任者,是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文化课教师泛指学校内除体育与健康课程之外其他科目的科任教师,国内外部分学者还将其称为“非体育科教师”“n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本研究统一称为“文化课教师”。有研究指出,文化课教师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学校体育的治理效能、青少年体育学习效果产生影响^[2]。可见,文化课教师并非新时代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局外人,相反,文化课教师跨界参与并助力是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若能充分发挥文化课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青少年体育发展之路将更加宽阔和高效。近年来学界一直在探索如何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并助力发展青少年体育,尤其是学校主阵地作用格外受到关注。但现实中依然存在重重障碍,体育这一义项在如今的学校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促进和保护学生身体发展似乎只是体育教师的事情^[3]。作为“教育系统结构中最具稳定性的主体之一”以及“在处理教育、课程和教学等事务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4],文化课教师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价值却始终被忽视。鉴于此,有必要就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相关议题展开深入论析。

1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

1.1 文化课教师赋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天然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履行“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义务。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形成全社会“共担责任,形成合力”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共同责任机制体制。为尽快落实《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中提出的“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重点任务,相应的联席会议机制已经建立形成。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把控整体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一环,是学校全体教师的共同职责,充分说明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职责。

2022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体育法》)将原有“学校体育”一章更名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并要求“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坚持“体教融合”,协调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必然需要体育教师与文化课教师的紧密合作,学校域内所有教师不可割裂地施行德、智、体、美、劳“五育”,无论是文化课教师还是体育教师均有“育体”的法定义务。就文化课教师而言,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文化课教师担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天然使命,且已具备法律支持和保障。

1.2 文化课教师具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禀赋

在学校工作实施过程中,“教育活动中的体育”如文化课中对体育的融合与运用、文化课中穿插渗透的体育与健康教育、学校文化活动中展开的体育活动等等^[5],一直以来就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同遵循,可见文化课教师一直在为青少年体育发展付出心力。一方面,文化课教师所具备的良好教育学基础及其自身所学与所教科目的学科文化和知识背景,是教育系统内弥合既有体育教育不足的重要文化教育资源优势,借助文化课教师

的助力可以打开学生认识和体悟体育的别样视角,能对学生形成不可估量的体育与文化素养方面的教育与涵养。另一方面,相较于体育教师,文化课教师除了是“教育系统结构中最具稳定性的主体之一”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而且更具有师资数量与课时量(育人周期)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化课教师更好扮演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引导者、帮助者、陪伴者等角色。

早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便提出“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这为文化课教师依托各自学科参与学校的健康教育活动提供可能。2022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简称“新课程方案”)出台实施,其中就 16 门课程分别提出跨学科实践的具体要求,并提供各自可资借鉴的教学案例。自此,文化课教师以各自任教学科展开向体育与健康主动融合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势在必行。更为重要的是,“新课程方案”的出台实施为文化课教师继续并深入发挥其资源禀赋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依据和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

2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机理

2.1 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布局的整体推动

少年强,则国强。进入新世纪,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等明确指出其他任课教师不能挤占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时间,要在课堂教学中融合健康坐姿和用眼方法等知识技能,关心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进入新时代,关于学校体育及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详尽和全面,如《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体教融合的育人理念和举措,破除体育与教育间的“门户之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将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体教融合协同育人进一步深化。《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体育与健康教师及其他教职工的全员育人作用,构建面向人人、人人有责的健康教育体系。《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每节课间都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以确保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将 1.58 亿中小學生从繁重的文化课学业中解放出来,摆正学校领域内教育及体育的突出位置。随着“双减”政策不断推进及课后文体服务全面施行,学校领域内文化课教师与体育教师的深度合作便十分必要。为有序有效落实“两操”“大课间”以及“到校后 20 分钟及每天校内、校外各 1 个小时体育活动”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任务,体育与健康师资独力难支,因此更为广泛地吸纳文化课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是为亟需。

2.2 整体健康观念引领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和国家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2014 年以来,指向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5]。“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整体健康观念与思路正在形成。整体健康是指人随着环境变化积极主动地调节自身行为,并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发展与变化过程中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管理,基于此呈现出个体发展全面、自我与环境和谐有序的本质表达。整体健康观念聚焦健康的社会问题,强调从日常行为与生活方式入手,探求积极自主的健康干预^[6]。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群众意识到健康之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并不再满足于健康的身体,转而开始注重合理饮食、睡眠等生活行为习惯,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尤其是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失,同时也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向往,至此体育促进健康、幸福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青少年承载国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是“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的重点人群之一,既是未来“美好生活”的受益者,更是构筑者。但是,青少年缺少“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管理”的能力。《“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的工作要求,提出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以及引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的现实之需。体育服务于美好生活的最佳路径就是化于生活、成为生活。文化课教师,既是健康生活的追求者和践行者,也是青少年学生的主要教养者和陪伴者。文化课教师较之体育师资人员更多且与学生共享大量的学校教育时间,已经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加之应试教育影响深远,学生家长也更为信服文化课教师(尤其是考试科目的科任教师)的权威和专业。文化课教师在青少年学生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显著,文化课教师“借体发挥”融合育人作用已经成为多方利益诉求的一致表达。

2.3 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借鉴国外有益实践的积极行动

体育事业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为进一步发挥体

育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全力擘画的宏伟蓝图。体育强国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2019年8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已经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点工作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的基础性工程^[7]。当前,我国关于学校体育领域的顶层设计已趋于全面详尽,但是仍需继续汲取域外有益经验,以更好地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相较而言,国外部分国家以学校体育夯实青少年体育之基的实践行动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在美国学区内施行的“综合性学校体育活动计划”,积极吸纳体育教师、文化课教师、其他教职工、家庭和社区成员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之中,共同为青少年体育参与创造条件与环境^[8]。此外,美国还探索出科际整合体育教学模式,在各学科任课教师的协同合作下将体育与相关学科的培养目标、学科内容加以整合,将彼此相关的学科知识与技能整合到同一课堂之中,以此引导和强化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的练习和运用,进而强化相关学科领域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效果^[9]。在日本,学校教育过程中比较重视文化课和体育课的“共同的核心”(如规则、规章等),要求相关课程教师主动融合体育与保健的知识和技能,开发具体可适用的“能力应用单元”,展开跨学科的育人活动^[10]。同时,日本格外重视课外体育的教育意义,不仅要求强制性执行,还有大量文化课教师自觉参与其中,极大促进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水平^[11]。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顶层设计需要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为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还需要更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勇气,诸如美国和日本的先行实践亦可为我国把握重点人群、促进青少年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助益。

3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之困

3.1 正式制度建设与更新滞后,不足以保障文化课教师的切实权益

党和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还缺少文化课教师介入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和制度支撑。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青少年体育的关注有增无减,各种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类文件401个,其中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体育、增强青少

年学生体质的意见》的有关文件34个,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有84个^[12]。进入新时代,大量更加权威、全面、细致的政策,如“双减”、体育课程思政、新课程方案相继出台实施,皆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学校体育制度之基。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度刚性正在不断强化,但凸显学校体育地位和功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自出台以来的实施状况与效果却差强人意^[13]。其原因在于学校体育政策注意力的偏失,诸多政策文件立足于学校体育发展的跨界与复合特性,往往仅仅表达寻求体育、卫生等部门协同合作的愿望,却始终对教育部门辖下的文化课教师“视而不见”。梳理历年来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文件,论及多元主体之时往往都涉及体育教师、青少年、家长、社区成员、政府等,却极少提及文化课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截文化课教师参与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工作的通路。

现代学校制度是促进教师更好地教及学生更好地学的制度体系^[14]。我国既有学校体育政策主要聚焦于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和健康教育,而对跨学科主题学习涉及较少^[15]。跨学科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革命,目前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实践规范与学校制度建设。学校域内关于跨界融合体育与健康的教育创新举措无据可凭,使得原本可以依托各自学科背景优势拓宽青少年体育服务时间与空间范畴的文化课教师因此望而却步。即便文化课教师一直在早操、课间操、运动会、体质测试乃至“教育活动中的体育”等环节参与学校体育事务,但是,这些都是学校工作中的常规事务。没有政策制度的支持,相应的待遇权益便无从谈起,而面对本就繁重的教学任务,文化课教师自然没有过多主动参与青少年体育的心力。

3.2 非正式制度建设效力低微,不足以催发文化课教师的内在动力

文化课教师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不仅有政策制度上的层层“窗纱”,还有学校域内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因为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嫌隙,如文化课教师始终认为早操、课间操、体育中考等工作均是体育教师的份内事。体育教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刻板印象及其工作的“非专业性”仍是文化课教师的“共识”,以及学校领域内各种学科小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环境造成的以人数占优的文化课教师群体指向体育教师的有意无意的“人数暴力”^[16]。

学校体育领域内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亦没有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可供参考。当前,诸多社会大众认可并遵从的非正式制度(如价值信念、

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对学校体育相关行为主体的约束力式微甚至丧失,致使很多政策难以协调运行,学校体育工作也受到牵制。应试教育环境下,“学校体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导致体育在学校教育域内的地位日渐边缘,面对繁重的文化学业任务体育难以成为学校、社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课教师更没有兴趣或动力参与其中。《体育法》明确指出,要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但恶劣天气、节假日、各种考试、文化课教师“要课”等导致体育课无奈被占。对此,学校既没有针对的预防机制,也无有效的补偿机制。虽然,在中考前夕几乎全员出动监督学生课外加练相关体育中考项目,但是,这样的“补偿”不仅徒增文化课教师工作压力,又拒绝给予适当的利益回馈,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亦无实际教育意义。总之,不得挤占体育课,在一线学校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常态”。文化课教师和体育教师均因拗不过应试教育大环境下追逐文化课学业成绩而产生的强压,只能选择顺从;拗不过领导、班主任及其他文化课教师的“人情世故”,无奈选择默认;拗不过业务成绩带来自身的生存生活条件的些许改善,最终选择同流。挤占体育课,仍是众多学科教师的“共谋”行为,可见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征途仍可谓漫长。

4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策略

4.1 推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以学科文化涵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跨学科学习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正试图打破藩篱,尽可能多地鼓励青少年学生、教育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学习与合作^[17]。2022年版“新课程方案”中16门学科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架构上共用“核心素养”而非“学科核心素养”,即遵从核心素养的唯一性,恰是在强调多学科合力育人的思想^[18]。核心素养的落地必须以知识为前提^[19]。文化课教师各自拥有的学科文化背景和底蕴,有益于将体育基本理论、运动文化、健康常识等知识性课程内容隐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之中,通过文化课教师的资源整合与转化并适用于相关文化学科课堂,有助于弥合体育课程中失落已久的“文化育人功能”^[20]。因此,要赋予并践行文化课教师“文化使者”的角色,在保持独立学科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在文化课教学过程中渗透基于体育文化自信的教育实践,以跨学科主题学习增强体育文化涵养,深化课程文化育人功能的整体性发挥,规避“学科系统育人功能的结构性沉默”^[21],

用体育文化滋养和丰富学生的体育现实世界。

“新课程方案”要求“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强调所有学科课程内容的结构化设计,将碎片化的学科知识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间的横向联系,也要把握知识层面间的纵向进阶,更重要的是顺应学生生活经验与学习逻辑,将价值引领、知识获得、方法训练与素养培养过程有机融合,使学生在经历主题学习或任务学习后,可以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有更广泛、更深刻以及更高层级的综合认识和解释,实现更有效的迁移应用。文化课教师须跳出分科教育的窠臼,树立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观,立足各自学科文化底蕴开展基于实际教学情境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发挥多学科合力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提升青少年学生核心素养。学校体育领域历来就有“教育活动中的体育”,文化课教师应“借体发挥”,利用体育独特的魅力升华其他课程的文化育人功能。具体而言,第一,找准其他学科与体育学科知识的内在关联,整合并适用兼具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点,提升学生理解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应用中完善和强化学生的知识建构。如政治、历史中可以拓展介绍“土洋之争”“举国体制”“乒乓外交”;美术课上,学生基于对某项运动的观察设计并完成简笔画;数学课上,知悉径赛中长跑的起点及其距离的算法。第二,引导学生观察和感悟社会中存在的体育文化现象(如网球运动中的礼仪、足球比赛中的“人浪”、冰雪运动的地域性;相关术语如“黄牌警告”“规定动作”“短平快”的社会生活意义)并迁移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之中,藉此培育学生的运动文化涵养和体育情怀。除此以外,文化课教师还应善用因“应试教育”确立起来的权威和声望,以身示范,积极引导学区内学生家长和其他民众与青少年学生一道参与体育锻炼,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可以助力涵养青少年核心素养。文化课教师在试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实践之时,还应积极探索学科统筹、结构合理的整合体育与健康要素的课外作业实施路径与机制,使作业成为学生在课外、校外(家庭、社区)等不同时空领域的行为自觉。作为文化课教师,应将“双减”和“新课程方案”的精神要义融入学科教学实践,紧紧锚定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目标,从课内转向课外,主动跨界、主动融合,将体育与健康要素融入文化课作业之中。具体而言,可以书面作业形式整合学生多学科知识的识记与应用,在耳濡目染间奠定学生认知及从事体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如2021和2022年新高考I卷、全国乙卷的4道语文作文题,便可作为

“借体发挥”“借体喻理”的作业典例^[22]。文化课教师还应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发掘自身实施文化课作业的有益经验,参与并辅助体育教师实施课外体育作业,帮助体育教师提升体育作业设计能力以及体育作业实施效力。当然,文化课教师必须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尊重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专业性及体育作业实施中的主导地位,自觉担当体育教师的“助教”,与体育教师一道开发并实施基于跨学科整合的体育课程。

4.2 共育校园体育文化,形成非正式学习空间内师生共在的课外体育制度

作为一种教育契约形式,多方协作已成为我国回答学校体育何以培育青少年的常态化机制。其中,学界关于“家校社”体育一体化发展业已产出大量研究成果,为相关探索实践作一定的理论铺垫。但是,这些研究多忽视家庭、学校、社区三者在空间中的布局与距离,是一种“空无边界”的理想构想。只有认识到空间承载在地居民的体育活动及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只有认识到体育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性和互补性,方能基于合理边界将家庭、学校、社区三者限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予以有效的资源整合,进而释放家庭、学校、社区协调共生共发之合力。还需要明确,文化课教师对青少年体育的助力,主要也是在学校空间和学校教育时间中发生,且需要与“家校社”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展开深度合作。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并非逾越本职,毫无边界地干预学校体育工作。虽然,文化课教师可以主导并施行跨向体育与健康的学科教学实践,但是该过程强调文化课教师对自身学科深刻的“自我认同”并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立场。例如,语文课教师施行整合体育元素的教学活动,一定是为达成语文学科的特定教学目标,体育元素在其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同时也必会对语文教师、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学科方面的素养提出一定要求,甚至倒逼其体育学科素养的学习与提升。

非正式学习空间已经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23]。较之于正式的学科课堂教学,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出现有助于文化课教师促进青少年的创造性成长。文化课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学校空间和教育时间,打通课内课外、课前课中课后乃至校内校外的学习壁垒,营造轻松和谐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为青少年的非正式学习创设环境。鉴于此,需要加快推进学校体育空间、生活空间的治理,优化学生从家到学校这一轨迹上所能联系到的一切资源要素的整合与融合,打造有利于“家校社”体育一体化发展的体育环境。空间治理视域下的“家校社”体育一体化环境具有时空资源的便利,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青少年体育的制度根

柢。因此,首先要纠正既往发展理路中对“多元主体”理解的疏漏,促使文化课教师也参与到学校体育环境的营造与维护。空间在被建构的同时也需要建构出一套由人们自觉遵从的制度秩序^[24]。文化课教师作为“家校社”中除体育教师之外受过专门训练的教育工作者,要与城内其他主体一道建立学校(“家校社”)体育指导委员会,为学校体育的环境营造和长效运行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要利用文化课教师的榜样力,推动形成文化课教师、体育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社区成员间的常态联系与互动,引导彼此养成良好的体育健康惯习,营造和谐的体育社会环境,为青少年学生创设师生共在的非正式体育学习空间。

《体育法》鼓励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免费向学校开放使用,为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提供服务保障。因此,可以把握“家校社”空间就近分布于特定学区的特点,利用学区资源为青少年的课外体育活动创造便利。学区化办学制度的形成将大部分青少年学生九年义务教育时光(约为6~15岁)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学区,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25]。可以充分利用学校、上学路径、学区房3大要素构成的既有建成环境,以及家校两点之间的路径、街道、慢行系统、公园、少年宫、体育馆、图书馆等公共配套设施,打造适于青少年、学校教师、家庭成员、社区居民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主体共同在场的“体育通道”,将指向社区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转变为指向学区内的“15分钟健身圈”,促使青少年在学校课堂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得以在身边的生活环境中就近、就地发生。同时,需要注意因组织制度僵硬带来的“边界困境”阻滞学区内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尤其不能强调社区或学校的单方面利益,从而将彼此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反之,则是要扩大开放力度,突破学校、社区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把我国的教育及体育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青少年体育的治理效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由政府出面高位推进城乡空间治理和学区制度改革,主导并优化学区设置及资源配给,以学区内成员对文化、娱乐、体育、健康的生活需求为抓手,统筹学校与社区、社会关系,推动建立体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4.3 优化学校教育与学生体育政策法规,建立多元主体共同育人长效机制

共育机制及其作用缺失,掣肘我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26]。学校体育制度建设与治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备,是助推多元主体参与并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新时代下,文化课教师已不再是青少年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的局外人或旁观者,而是共育青少年的关键力量,同时文化课教师的介入是对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学校体育实践的有益探索。基于对党和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政策的研究和学界既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谋求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既有文化课教师参与的必要,也已具备文化课教师参与的可能。

切实保证多元主体能够参与其中,尤其是文化课教师的介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制度体系,丰富和加强学校体育的法治建设,为文化课教师的参与提供强力政策依据。因此,要由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完善学校体育法制体系,《体育法》为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提供强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为切实发挥《体育法》的效力,应及时跟进学校体育域内相关政策设计。其中,实施近30年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简称《条例》)已经略显滞后,在学校体育变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下亟需修订与调整。一方面,就文化课教师而言,作为青少年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应该在《条例》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条例》应该紧扣“双减”“新课程方案”等提出的新要求,围绕课后文体服务和跨学科主题学习等新情况进行修订。《条例》中提出关于“组织学生远足、野营和举办夏(冬)令营等”“组织课间操(早操)、课外体育活动”“班主任、辅导员应当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一项工作内容”“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以及大、中学生体育协会等组织在学校体育工作中的作用”等工作要求,却在一定程度忽视部分事实,即中小学许多课(余)外体育活动实际上都是有文化课教师参与的,以及学校“教育活动中的体育”离不开文化课教师及其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现代学校制度强调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并将服务学生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核心^[27]。现实中,很大比例上的文化课教师都有擅长的体育特长和稳定的体育爱好,甚至部分文化课教师还是通过国家资格认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具备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资质与能力。相关研究表明,文化课教师从事学校体育相关工作可以取得同样优异的成绩^[28]。2017年10月8日,教育部印发的《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兼职体育教师的选聘对象是其他学校专业体育教师,校外教育机构、体育运动团体与体育系统的有关体育工作者,对兼职人员的专业底色做出严格限定,而对文化课教师则没有明确规定和建议。面对体育师资结构性缺编的暂时窘况,可以在相关政策文本的表述中扩大兼职体育教师范畴,给予文化课教师进入的可能。继顶层设计后,还需降低学校管理重心使政策落地。在地方、学校层面的实施过程中,除了要精准解读和践行国家的教育政策,还须自

主摸索,形成适合实际情况且利于发挥各方主体积极性的政策制度,为文化课教师的常态化参与创设条件,为文化课教师的价值生成做好铺垫。具体而言:第一,要贯彻落实“新课程方案”精神,建立非体育学科进行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工作机制,明确“跨学科主题教学课时不少于各学科总课时的10%”的基本要求,形成对诸如“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实践行为的强制规范。第二,学校制度必须保障个体和社会同时受益^[29]。因此,要优化教师评价制度,将参与跨学科主题教学实践、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事务纳入工作量计算、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等管理环节。第三,要建立形成长效的“挤占”体育课的补偿机制。无论是因为客观原因(天气、运动会、放假、体育教师生病等)还是主观原因(各种考试、赶教学进度等)而挤占体育课,都须当形成记录,并由占课教师或体育教师以特定形式予以“补偿”(如开展体育与健康理论课、文化课教师参与主导的室内课桌舞、“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课后“文体”服务等),并逐步使其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第四,要打破学科间罅隙,构建跨学科的教师专业共同体。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领域和效力是有限度的,需要以跨学科主题教学为契机突破学科壁垒,深化不同学科教师间的协同合作,进而盘活学校域内所有优质师资,有序开展文化课教师与体育教师在教学、教研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探索有效的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协力做实做好学校青少年体教工作。

4.4 祛除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及行为,躬行体育化、生活化的教书育人实践

人们做出行为选择更多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或激励,而正式制度往往只能决定一部分人行为选择中的一小部分,若要发挥正式制度在现实中的作用,便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补充与支撑。在学校体育域内,传统重文轻武教育观念下民众和社会对体育的偏见始终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工作态势尚未彻底改变。随着党和国家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民众对健康的态度日益提高,推进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相关非正式制度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总体而言,要以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先,祛除功利化教育观念,将五育并举、体教融合育人理念落到实处。文化课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直接责任者,不仅要探索融合体育要素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应让体育融入文化课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积极践行体育化、生活化的育人实践,让文化课教师群体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引领者,进而形成对青少年学生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

教师职业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作。近年

来,党和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都蕴含提高教师地位与待遇这一核心要义,无论是文化课教师还是体育教师都应深刻领会党和国家对教育、体育的高度重视,争做党和国家要求的“四有”好教师。“新课程方案”放弃“学科核心素养”的用法,转而在16门课程中同用“核心素养”,即是对所有学科教师地位与价值的同等对待。全体教师应端正职业认同,秉持教育情怀,共同守护教师职责和使命,正视体育教师对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大价值。理性对待因为既有教育评价制度不健全导致青少年发展权益受损的问题,转而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教育教学,为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奉献力量。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日渐规范以及体育进高考的趋势日益显现,文化课教师亦需要摆正育人观念,在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过程中不再单纯地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不再扮演青少年体育参与的“监工”,防止“体育考试”演变为新一轮的“应试教育”。

学校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还应关注于师生投入的高品质的日常化教育活动^[30]。因此,要让文化课教师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忠实拥趸。其一,借鉴“工间操”“居家锻炼”的经验,让文化课教师自身成为体育生活化的倡行者。同时,构思设计文化课堂上易于施行的富有节奏性的、身体局部参与的身体活动,如课桌舞、手指操。其二,利用文化课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相处时间更多的优势,依托体育要素介入学生的教育时间与生活世界。2022年12月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杭州钱塘区下沙中学没有布置文化课作业,而是让学生看足球比赛^[31]。该举措虽说是学校在管理工作上探索实践的一小步,却是尊重并给予学生释放空间的一大转变。或许,梅西、C罗、魔笛所奔跑的绿茵场自此便在学生心中支起一片有关足球和生活的浪漫“星空”。这种“刚柔相济”的管理制度,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教育理念。其三,文化课教师需要响应和践行“新课程方案”要求,秉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全人”的理念,深刻认识在文化课中融合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价值与意义。在既有跨学科实践制度支持较为缺失的背景下,敢于忍受因为摸索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带来的文化课教学效率与质量受影响的短时阵痛,走出“摸石头过河”探寻跨学科实践有效路径的第一步。

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学校须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面的智与力的支持。以学校为主阵地应对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題,应该考虑吸收文化课教师的力量。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使命任务,其建设时间的紧迫性及目标实现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都与文化课教师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关联,如果文化课教师一再囿于自身学科单一思维,拒绝深刻理解并践行新时代要求下的融合育人实践,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之路也将缺少活力和效力。在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制度允许范围内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是文化课教师的天然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文化课教师也具备独有的资源禀赋。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并不是舍本逐末,僭越体育与健康教师职业角色及其工作内容,而是鼓励和引导文化课教师立足自身学科教育教学活动跨界融合体育与健康元素,在提升学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将体育及其文化意蕴整合到相应的学科知识体系之中,是鼓励和引导文化课教师自觉参与体育锻炼、建设丰富校园体育文化,为青少年学生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的示范与标杆,为青少年体育参与营造和谐环境。作为青少年体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体育”的主导者,作为“在处理教育、课程和教学等事务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文化课教师与体育教师及其他学校教职工的默契共谋,将为高质量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拓宽视野和道路。

参考文献:

- [1] 潘绍伟,于可红. 学校体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52-53.
- [2] 张文鹏,李经展,赵子建. 县域学校体育内部治理的演化博弈[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7): 56-63+88.
- [3] 项贤明. 学校体育的本质及其异化[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3(3): 3-13.
- [4] 珍妮·H. 巴兰坦,弗洛伊德·M. 哈马克,詹妮·斯图伯. 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M]. 苏尚锋,译. 第8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1+62.
- [5] 李娟,刘紫薇.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内涵、现实困境与多维路径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0(1): 49-54.
- [6] 王立杰. 健康社会学视角下整体健康的本质表达与实现路径[J]. 体育科学, 2022, 42(4): 80-85.
- [7] 王健,崔耀民,刘玉财.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选择: 优先发展学校体育[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3, 38(1): 1-8+16.
- [8] KARP G G. Integrating comprehensive school physical activity leadership into PETE and beyond[R]. Paper presented

- at the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Las Vegas, NV, 2012.
- [9] CONE T P, WERNER P H, CONE S L. Interdisciplinary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M]. 2nd. Ed. Human Kinetics, 2009.
- [10] 川岡杏子. 中学校における「ルール」「決まり」を視点とした教科横断型の授業開発——社会科と保健体育科の場合[J]. 社会認識教育学研究, 2021(36): 61-70.
- [11] NAKAZAWA A. Seeing sport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 postwar history of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in Japan[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2014, 45(1): 1-14.
- [12] 编写组. 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报告(2015)[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13.
- [13] 陈悠, 汪晓赞. 学校体育政策系统特征、问题及对策[J]. 体育文化导刊, 2022(4): 96-102.
- [14] 张清宇, 苏君阳. 现代学校制度下教师制度化参与的内涵及意义[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7): 43-48.
- [15] 张文鹏, 杨方正, 徐亚楠, 等. “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 新课标落地执行的政策工具研究[J]. 体育学刊, 2023, 30(1): 81-89.
- [16] 王先茂, 凌晨, 董国永, 等. 污名化背景下优秀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的经验与启示[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6): 25-33.
- [17] SCUP ACADEMY COUNCIL. Report on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Planning 2014[M]. Ann Arbor, MI: Society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lanning(SCUP), 2014: 8.
- [18] 郑桂华.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核心素养”之名与实辨析——以语文课程标准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2): 24-29+54.
- [19] 崔允灏, 郭华, 吕立杰, 等.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標、标准与实践向度(笔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9): 6-19.
- [20] 尹志华, 孙铭珠, 孟涵, 等. 新时代核心素养导向体育课程改革的缘由、需求机理与推进策略[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1(4): 22-28+70.
- [21] 郭元祥. 论学科育人的逻辑起点、内在条件与实践诉求[J]. 教育研究, 2020(4): 4-15.
- [22] 张晓林, 关清文, 谭步军, 等. 体育融入高考语文作文的主要内涵、价值取向及实践启示[J]. 体育学刊, 2023, 30(2): 67-73.
- [23] 邵元江, 张佳. 中小学非正式学习空间建设: 前策划、中设计与持续改进[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22): 67-75+84.
- [24] 唐小俊. 空间社会学: 透视学校“生活德育”的新视角[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12): 35-38.
- [25] 万博. 当代北京学区空间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8: 13.
- [26] 何劲鹏, 杨伟群, 赵家庆. 基于程序正义的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目标定位及制度保障[J]. 体育学刊, 2022, 29(6): 105-111.
- [27] 马怀德, 褚宏启, 劳凯声, 等.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七人谈[J]. 人民教育, 2004(17): 7-10.
- [28] CAMIRE M, ROCCHI M, KENDELLEN 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n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ho coach high school sport tea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 Coaching, 2017, 12(5), 557-564.
- [29] 余雅风. 公共性: 学校制度变革的基本价值[J]. 教育研究, 2005(4): 22-24+84.
- [30] 李伟胜.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从哪里来?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7): 29-34.
- [31] 伍里川. 不留作业让学生看场球是教育应有的柔度[N]. 中国青年报, 2022-11-25(006).